

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

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概念

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诗经》就是一部有重大价值的古代诗歌选集。

研究文化遗产，必须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在论述精神生产时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恩格斯指出：“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②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③他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51 页。

② 《恩格斯致弗·梅林》，同上书，第四卷 50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0 卷 6～7 页。

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①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我们对待古代文化的根本方针:“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发展的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②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③

这是我们处理文化遗产的“纲”,也是《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

研究《诗经》,首先要明确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的概念。

要明确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诗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最古的一部诗歌选集。这部诗集结集二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创作三百〇五篇,举其整数,省称诗三百。它们产生的时代是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所以都是周诗。据先秦史籍的大量材料,《左传》《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诗》云”,《论语》记孔子称《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中也通称如上述。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的本名,它原本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它被称作“经”,是由于孔子曾经把它和《书》、《易》、《礼》、《乐》、《春秋》一起当作传授弟子的教本,以后的儒家学派把它们称作六经。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 36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6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499 页。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儒家学派地位的变化,汉代以后,孔子被尊奉为神圣的偶像,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国教”,儒家的五经(六经中的《乐》经亡佚)被尊为神圣的经典。一部古代的诗歌创作就被歪曲为宣扬封建礼义的圣经。

什么叫经?经字释义约十四种,约略可取者:有人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有人释经为直线,五经讲的都是至理;有人释经为规范、原则,五经讲的都是思想道德的标准;这都不够具体明确。古时这些典籍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用绳穿起来,称为经;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小的竹简或木板上,称为传。这样的分别是表示前者的重要性。经名的最初由来,和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它们演变为“圣经贤传”,作为最高的思想道德标准来统治人民,已经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还叫它《诗经》,只是按照习惯,沿用已经两千年的旧称。对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不当作什么典范。

要明确的第二个基本的概念是:《诗经》不是一人的创作,也不是一时一人所编集,它是约五百年长的时期中的集体创作,并在更长的时期中,经过无数人的采录、辑集和不断加工。

今本《诗经》各篇,最早的产生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创作于东周春秋中期。产生的地域,一半在王畿,一半在现在黄河流域的大部和江汉流域的一部。从内容来看,有宗庙祭祀诗、朝会和典礼诗、贵族阶级的抒情诗和各国民歌。显然,包括年代长远、地域辽阔、内容繁多的这些诗篇,决无可能是个人或少数人的创作。民歌自然是人民群众的诗歌创作,它历来无法流传作者,即使王官乐师制作的乐歌和贵族阶级的抒情诗,在长期流传中也经过人们不断修改加工,也已经具有群众性创作的性质,其中几篇有作者署名,像家父、寺人孟子、吉甫,但我们对他们的情况无法了解,仍然和无名氏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各篇作品的内容,来大致确定各篇作者的阶级属性,不可能也不必考定各篇的作者究竟是谁。旧解说各篇是某些王公圣贤的传世之言,多是欺人之谈。三百篇诗是各代的王官乐师逐渐采集积累起来的,编集和整理也非孔子一人之力。孔子只是在前人已经辑集的基础上,进行一次重要的整理刊订,后人又进行过一些加工。我

们现在看到的这本集子,是自汉代以后传下来的定本。

但是,这部诗集虽然长期中经过很多人的删订加工,基本上还是保存了它原来的面貌。这由于它在最初辑集时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诗本来有格律、音韵的限制,在汉代以后,又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词汇、语法、语音都有变异,到汉代时,先秦史籍已经成了古文,三百篇无人能够尽通,只有保存原貌。因此,它基本上是一部可靠的古代文献。

要明确的第三个基本的概念是:古人对《诗经》的许多注疏像重重叠叠的瓦砾,掩埋了这些诗篇的真正意义。旧时对三百篇的章句训诂,尤其是诗义的题解,大多是不可靠的。周代贵族阶级以及孔子及其门人,由于他们的阶级偏见和政治需要而利用这些诗篇,他们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的民歌创作和大量的政治讽刺诗作出正确的解释。到了汉代,它真的变成了经典,像古代希伯莱民歌被收进《旧约全书》变成圣经,欧洲中古时代的教会学者附会许多迂腐穿凿的解说,中国的经师也用封建教义给《诗经》加上种种附会和曲解。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对《诗经》许多篇章的注疏,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歪曲各篇的内容和意义的。不扫除这些瓦砾,不拨开这些迷雾,我们便认识不到各篇的真正面目。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两千年来的万千学者,在训诂上下了毕生的苦功,我们如果不参考前人的解释,首先就无法排除文字的障碍,《诗经》在我们面前只是一串串不可理解的上古文字。因此,尽管旧的注疏和研究是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运用的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但毕竟不可能完全抹煞,对有些诗义的解释,还有可取之处;文字和名物的训诂,也有一些正确和有用的部分。离开了它们,我们就会一无依傍。任何学术的进展都是在无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点滴积累起来的,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一概排斥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回到黑暗中去摸索。

要明确的第四个概念是:我们阅读和研究《诗经》的目的和意义,与过去传《诗》不同,因此方法也不同。

总的说,过去对《诗经》有三种读法: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

经学的：它被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封建社会国定教科书，封建教化的重要工具，传《诗》的目的“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人事浹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欲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诗集传序》）强加给《诗》以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作为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必修科目，这是封建社会传《诗》的主要目的。

历史的：明、清人已经明确提出古代经典的史学价值。明王阳明说：“五经皆史。”清章学诚作了具体的论述：“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这就跳出经学的圈子，把这几部古籍看成古史材料。关于诗歌的史料价值，他又说：“诗类今之文选耳，而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废，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于是中者，如《鸛》之于《金縢》，《乘舟》之于《左传》之类。其出于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欤！”^①

文学的：《诗经》本来是诗歌创作，历代也有诗人学者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和学习。从荀卿作《俛诗》，到《楚辞》、汉代乐府民歌、繁盛的唐诗，或从真挚深厚的抒情，或从反映现实的精神，或从比、兴、赋的诗歌表现手法，或从修辞技巧和结构形式，都不同程度地明显地受到《诗经》的影响。李白：“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②杜甫：“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③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强调风、雅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高度评价了三百篇，反复阐明诗歌应该发挥其补察时政，洩导人情的功用，积极反映和干预社会生活^④。他的《读张籍古乐府》诗：“为诗义如何？六艺互

① 《文史通义·易教上》，嘉业堂本《章氏遗书》。

② 前两句见《古风》之一，后四句见《古风》之三十五。李白与陈子昂等反对六朝以来诗歌浮艳的形式主义倾向，提出复古，即恢复风骚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主张。

③ 《戏为六绝句》之六，《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六。

④ 《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五。

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这些历史上的伟大诗人都提倡继承《诗经》以诗歌创作批评政治、为改革社会现实服务的现实主义传统。

上面三种读法,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以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经学为主。

我们研究《诗经》这一份文化遗产,则是为了吸取其精华,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我们也有三个目的、三种读法,即:文学的、历史的、经学批判的。

第一,我们认为《诗经》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上古时代我们民族光辉的艺术成就,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世界大多数民族还处于野蛮蒙昧时代,我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生产已达到高度的文明。通过对这些诗篇的文学欣赏,我们能够形象地了解古代社会的广泛图景以及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和感情。这些诗篇又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它直接为改革政治、为揭露社会弊病、为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一些优良的艺术经验,对中国文学二千余年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因而,对这部文学名著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观点进行学习和研究,至少应该阅读并熟悉其中的名篇。

第二,《诗经》是研究我国古代史的一部比较完整可靠的重要史料,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学价值。《诗经》中的史料,较之其他古籍要真实可靠。它虽然也有脱简错简之处,但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更可贵的是其中很少后人的伪作。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揉,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诗经》和《尚书》是同时代的,二者都经过秦火,《尚书》损伤很大,《诗经》却依靠记诵而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如《汉书·艺文志》所说:“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诗经》当然不一定“字字可信可宝”,在先秦也经过儒家的删订润色,但是《诗经》仍是我们研究周代社会和文化必须依靠的最重要的史料,不仅对于研究周代的经济、政治、阶级斗争、部族斗争、人类

生活和意识形态有丰富的材料,对于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也必不可少。事实上,《诗经》中的各种材料已经广泛地被引用在各种史学著作中。

第三,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居于指导的地位,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延长起着重要作用。儒家的五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阐述和研究这些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为经学。范文澜说:“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二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多次变化并产生了各种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以不了解经学和儒家派别,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①封建社会的《诗经》研究,则是两千多年来经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的著作、它发展的简明历史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清代学者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有两个专题:《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②。他说了八条两大篇,归纳起来,主要只是说明一个意见:诗是采用讽喻的方法,不是直言本义,因而明了诗义比较困难。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中论到《诗》《书》难解的问题时,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之意义又不同,三也。”即使深有造诣享有盛望的大师,在对《诗经》的解释中,无论是解释诗义或解释词句。都难免有错误。

前人的困难,对我们来说依然存在。如果我们不能读通原诗和正确地理解诗义,也就无从进一步用之于文学的和史学的研究。所以我们第一步的具体工作,仍然是要注意训诂和解题。

① 《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144页。

② 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1~3页,中华书局1964年重版本。

训诂,就是对古书字句的解释。我认为旧有笺疏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重要贡献,没有前人对于文句字词的注释,我们今天阅读《诗经》还要困难万倍。但是,两千年间《诗经》的注释极多,各家注疏歧义互出,一字一词的解释,有时有多种甚至十几种,因而一句一章意义的分歧也就很大,真是“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古“诗无达诂”;而且,诗有异文讹字,注解也就产生意义的分歧。有鉴于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抹杀古人,又不迷信古人,尽可能多参考自汉以来的各种旧解,加以审慎的抉择或建立新说。

我们进行审慎的抉择或建立新说,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根有据,从词语、语法、音韵、名物、校勘各方面继续研究,从点滴入手,编集一部集大成的、比较完备的新的《诗经》注疏著作。

解题,就是说明每一篇诗的主题。两千多年的《诗经》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搞得最乱,错误也最多,可以说在旧的序传中比比皆是,但是,也要承认旧的序传在说明历史背景方面,有时也有可资借鉴之处,有些学者所作的训诂和解题,也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识,尽管大多仍是破而未立,对于我们还是有帮助的。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加以辨订,从了解《诗经》的时代入手,通过切实的训诂,在读懂原诗的基础上,根据诗篇本身的艺术形象和抒写,去探求各篇的主题和内容,然后进行文学的分析,或作为史料运用于历史的研究。

三百篇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我们现在已无法考证三百篇各篇的创作年代,只能大致论定其中最早的创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创作于东周的春秋中叶,全部作品产生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之间约五百多年的时间中。

这三百〇五篇诗分风、雅、颂三类。

风:一百六十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又称十五国风。

雅:一百〇五篇,包括《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又称

二雅。

颂：四十篇，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合称三颂。

三颂的时代

《周颂》是西周王室的庙堂祭祀乐歌，主要产生在西周初期奴隶社会的兴盛时期。《史记·周本纪》：成王“既继殷命、夷淮夷……兴正礼乐，而民和睦，颂声兴。”商、周之世奴隶主的战争中，战胜的奴隶主对战败覆灭的奴隶主仍保存其祭祀，可见上古时代对祭祀的重视。西周政治安定，经济兴旺，为巩固和发展这种兴盛局面，大兴礼乐，为此制作祭祀的乐歌。在整个“成康盛世”，这些乐歌已积累不少，昭王时又继续补充修订。从这些诗所祭祀的先王和所反映的史实来看，可以相信《周颂》大部分制作在公元前一〇五八年以后的七八十年之间^①。

据说，《周颂》中最早的诗，是武王伐纣胜利回朝祭祀文王时制作的《大武舞歌》六篇，在今本《诗经》中比较可信的尚保存其中的《武》、《赉》、《怀》三篇^②。最晚的诗是昭王初年祭祀武、成、康三王的《执竞》。这些都无法确考，我们只能大致推断它们产生在西周初期不到一个世纪之间。

《周颂》的制作，大约出自史官和太师（乐官）的手笔，当然是在镐京。这些诗篇记述先王的功业，歌颂功德，难免夸张揄扬；祭祀宗庙、祈福神明，又带有严肃古板和宗教玄秘的色彩。在写作上偏记事，少抒情，无韵律，缺文采，文学艺术价值不高。但是它们保存了周初奴

① 西周从武王灭商（公元前1064年）到幽王亡国，凡十一代十二王，据《竹书纪年》说共257年。中国历史有确实纪年，从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开始，共和以前年代都不甚可靠。武王灭商后二年死，其弟周公旦摄政七年，《尚书大传》：周公“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还政。”故其开始制礼兴乐在公元前1058年，《周颂》的大部分当制作在这个时期。

② 近人王国维《大武乐章考》提出今本《诗经》中的《昊天有成命》、《般》为《大舞乐歌》的首尾两章（见《观堂集林》卷二，1940年商务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二册）。近又有人提出《酌》也是《大舞乐歌》之一（见孙作云《从读史的方面谈谈〈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诗经研究论文集》）。二说均难定确否。如所说可立，《大武乐歌》就全部保存下来了。

隶社会兴盛时期的阶级状况、政治史实、经济发展、典章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确凿史料,因而具有极重要的历史学价值,是研究我国奴隶社会的可靠的诗史。

《鲁颂》比《周颂》晚几个世纪,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宗庙祭祀乐歌。鲁是周的后裔封地,在今山东一带。成王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关于《鲁颂》的来源,朱熹《诗集传》说:“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亦谓之颂。”这个说法是可信的。魏源《诗古微》卷六《鲁颂诗发微》:“僖四年,经书:公会齐侯、宋公等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召陵。此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旧侈阙绩,各作颂诗,荐之祭庙。”齐桓公率八国之师伐楚时是鲁僖公四年即公元前656年,所以现存《鲁颂》四篇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其中《閟宫》一篇作者署名奚斯,是鲁大夫公子。

《商颂》是宋国(都今河南商丘)的宗庙祭祀乐歌。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商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①。现存《商颂》五篇的内容,有的是歌颂宋襄公与齐、鲁合兵伐楚事,当与《鲁颂》同时期;有的是记述殷商先祖功业,可能是先世留传或后世所追述。五篇《商颂》产生的时间很长,其制作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1]。

二雅的时代

《大雅》全部是西周的作品,它们主要是朝会乐歌。其中一部分颂诗的内容与祭祀诗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它们应用于诸侯朝聘、贵族享宴等朝会典礼,比较只用于宗庙的乐歌,内容较为扩充。《大雅》的颂诗,有歌颂几位先王功德的题材,有追怀传说中周人先祖和开国英雄的题材,有赞美廊庙功臣的题材。这些对我们了解周初社会的

① 朱熹《诗集传》。

[1] 关于《商颂》上有宋襄公与齐、鲁合兵伐楚事,张松如研究认为非是。我在为其《商颂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所写序言,以及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演讲《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1996)重新谈了这个问题。二文均见《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学苑出版社,2000)。